先秦文学编年史(上)

主编　赵逵夫

本册撰稿　赵逵夫　贾海生

商務印書館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学编年史(全三册)/赵逵夫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5265-8

I.先… II.赵… III.文学史—编年史—中国—先秦时代 IV.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144846 号

本书的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特致谢忱!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先秦文学编年史

(全三册)

XIANQIN WENXUE BIAN NIAN SHI

主编 赵逵夫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265-8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700×1000　1/16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0.5　插页 1
定价:198.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代表国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集中展示这些优秀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文库》将按照“高质量的成果、高水平的编辑、高标准的印刷”和“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的总体要求陆续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会室

2005 年 6 月



作者简介

赵逵夫　男，1942 年生，甘肃西和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省文联副主席，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遗产》编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全国赋学会顾问。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与古典文献学研究，尤其在先秦文学与文化和诗赋研究上成就突出。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史》《文献》《中华文史论丛》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260 余篇；出版《屈原与他的时代》《古典文献论丛》《屈骚探幽》等专著；主编《诗赋研究丛书》。曾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3 项，教育部第二届、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各 1 项。

序 一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开端，也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这已是文学史界的共识。20世纪以来众多文学史著作，一开头，总是一章或几章，记述先秦文学，而其编撰框架，大体总分列为原始歌谣与上古神话、《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等，似已成为一个定式。这种章节性的结构，应该说也有其一定特色与长处。而现在由赵逵夫先生主编并具体参与编撰的《先秦文学编年史》，可以说是百余年来先秦文学研究从未作过的第一部编年史著述，体现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中难能可贵的创新意识与探究学术新知的开拓精神。

赵逵夫先生立意作这一项目，也可以说是我们彼此学术交流、研究切磋的成果。我于20世纪80年代末，曾就“文学艺术的整体”这一学术构思，与几位学界友人协商，拟对唐五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作编年史研究，后于90年代初正式起动，1996年完成《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交辽海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1997年8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和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逵夫先生都参与。会议期间，我即向逵夫先生介绍此事，并希望逵夫先生承一重担，即做先秦文学编年史，并转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曹道衡先生也将着手做汉至隋文学编年史。逵夫先生毅然作出决定，我们两人此后不断书信来往，细研此事，达成一种共识，即我们今后如有一部从先秦一直到清王朝结束（1911年），时间长达数千年的文学编年史，人们就可以按历史线索看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历程，这将是我们文学史研究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我之后将此意写于《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言中）。

我多年研究古代文学，总认为，除了研讨文学本身，还应扩大范围，注意文学艺术整体。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可能互相排斥而实际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当时政治、社会生活与时代思潮的影响。孟子曾对其高足弟子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便是他提出的"知人论世"说，对后世很有影响。现代学者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开头就说："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他的这篇文章，就是从整体上来把握魏晋文学的。系统的整体研究，这是鲁迅先生很早就建立起来的文学史研究的格局。法国19世纪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也提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我在1978年所写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序中，还曾引及丹纳此书另一处文，他认为艺术家本身并非孤立，"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由此可见，文学艺术的整体研究，古今中外，也早有共识，我们很值得站在新世纪学术发展的高度，作进一步探索。

当然，整体研究，也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这里不详作阐述。我出于个人的研究心得，觉得编年史研究，可能是整体研究中一条较有创新且有实效之路。拙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出版后，董乃斌先生特以"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为题写一书评(《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他认为，作为文学史书，作家创作和作家活动自然是其构成的最大要素，编年史著作即可以提供经纬细密的知识网络，"通过一系列作家们的经历际遇、游从交往和诗文创作，就可构建出一幅幅立体交叉而又连续活动的文学时代图景"。

我觉得，这对先秦文学研究更有必要，也更有意义，这部《先秦文学编年史》出版后，学术界和广大读者读后必有深切同感。先秦，自夏初至秦末，近两千年，因此先秦文学就不同于后世的断代文学，有其特殊地位，也应有符合其实际境遇的独特方法，否则就不大可能认识其完整面貌和历史进程。如逵夫先生在《前言》中所述，《尚书》、《诗经》，其时间跨度都各在一千年以

上，过去文学史著作都将此两书各作为一章分别论述，就淡化其时间进程。现在《先秦文学编年史》以纵向线索和横向关联，尽量逐年编排，就使这一长时段文学发展演变状况完整系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确如我过去曾说过，这样做，可能会引发出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如我这次初步检阅春秋、战国卷，确增新感。过去文学史著作，对文学作家、诸子学者，往往各自论述，其生平经历及活动环境，也易互相隔膜。现在我们读这部编年史，就可见到文史哲融洽的大环境。如书中记，庄子生于公元前 368 年或稍后，屈原生于公元前 353 年前后，其间相距仅十余年；荀子于公元前 325 年前后生于赵，宋玉于公元前 319 年前后生于楚之鄢，仅差六年。更有意思的，公元前 313 年，孟子在齐国，同年屈原曾为楚使于齐；孟子卒于公元前 302 年前后，而同时屈原则作有《天问》、《招魂》。我不是专门研究先秦文学的，但看了这些记载，确有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说“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相接”(《史通·杂识上》)之感，对文学观念产生一种探索兴趣。

应当说，对先秦文学作编年史研究，学术价值高，而其难度也极大，主要是年代久远，资料缺失，作家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及作品著作时间，众说纷纭；先秦作品的文学概念，也各有歧异。正因如此，逵夫先生为此做了大量、细密的基础工作。1999 年，他的这一选题，经过申报、评议，被批准立为国家社科基本项目，他就组织他所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围绕这一工程，撰写专题论文。据我所知，他这几年指导的博士论文，有《周初礼乐文明实证》(贾海生)、《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邵炳军)、《战国七十年文学编年》(裴登峰)、《颂诗的起源与流变》(韩高年)、《俗赋研究》(伏俊连)、《〈逸周书〉研究》(罗家湘)、《〈国语〉研究》(饶恒久)、《〈管子〉研究》(池万兴)、《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俞志慧)、《先秦文学思想考论》(徐正英)、《先秦时代几个重要文论范畴的研究》(郭令原)、《〈礼记〉成书考》(王锷)、《〈吕氏春秋〉研究》(黄伟龙)、《〈文子〉成书及其思想》(葛刚岩)、《〈鬼谷子〉真伪及文学价值》(许富宏)、《〈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周玉秀)、《〈韩非子〉成书及其文学研究》(马世年)、《先秦兵书研究》(解文超)等。我之所以详细介绍这些论文题目，是想说明，逵夫先生确想把先秦文学史上

的一些悬案、难点及重点问题搞清楚，这都是属于先秦文学文献与理论认识的基础性研究。

同时，我也注意到逵夫先生自己发表的一些论文，也与此有关，如《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周诗人芮良夫与他的〈桑柔〉》(《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问〉的作时、主题与创作动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庄朕事迹与屈原晚期的经历》(《文史》第58辑)、《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论讲史传统的流变与诗赋的正宗地位》(《光明日报》2004年7月7日)、《〈晏子春秋〉为齐人淳于髡编成考》(《光明日报》2005年1月26日)等。他的《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2002年第2版)、《古典文献论丛》等，也多是对先秦文学文献和有关作家家世、生平、创作及有关政治、军事等活动的考索。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不仅有很好的学术积累，近几年中更是集中精力作了深入的探讨。

另外，听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逵夫先生承担了一个教育部项目《唐前诗赋关系研究》，已经完稿，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接受，就因为后来进行《先秦文学编年史》研究，觉得两者间的问题相互关联，须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故未交稿。2000年，他承担了"西北师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先秦文学基础文本研究"。该项目包括三个子项目：《全先秦文》，是重编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和《全秦文》。听说他计划收集的严氏失收之佚文，未包括新出土甲骨、金石、简帛文字，也为严氏原书的二倍。第二个子项目为《全先秦诗》，计划收集全部先秦歌、谣、颂及铭赞之类的押韵作品，与《诗经》、《楚辞》通编，尽量按年代编排，以整体展示先秦诗歌的发展进程。第三个子项目为《先秦文论全编要诠》，是与其博士生合作，并分工将先秦所有文献梳理一遍，摘出有关文学理论、文艺思想及相关美学理论的文字，由逵夫先生圈定，分头进行注释。据说此书约80余万字，2003年已大体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受出版，在《先秦文学编年史》统稿结束后，也已定稿交出版社。这

三个项目实际上是《先秦文学编年史》的重要基础工作，也可由此作具体指导，使年轻学者掌握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今《先秦文学编年史》全书已完成，有100多万字。在2005年1月国家社科规划办组织的结项评审中，被评为优秀项目，并通报予以表扬。《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简报》2005年第2期通报十项优秀成果，第一项即为《先秦文学编年史》。我也曾见到此期《简报》，《简报》对《先秦文学编年史》的内容、范围、特色、成就，作了全面、准确的评议，特别指出："这是一项创新性很强、难度很大的研究工作，填补了目前我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没有《先秦文学编年史》的空白。"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结论。

依照我的习惯，我遵嘱为友人写序，总要翻阅书稿，有时还不止一遍。由于这部书篇幅大，专业性强，我未能细读，但仍有几点读后感，今再略述如下，与读者共商，并请教。

一、先秦时代一般认为文史哲不分，是否可以编《先秦文学编年史》，人们的看法可能会有不同。我以为，这一时段所谓文史哲不分，主要指散文作品，诗歌如《诗经》、《楚辞》以及佚诗，一般是不会视为史、哲之作的。实际上，所谓"文史哲不分"，只是相较于后代赋、小说、戏剧和文学散文同专门的史书畛域分明，并不是说全部都混沌不分。事实上，赋在战国末期即已产生；寓言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在先秦时也已大量出现，并广泛流传；《左氏春秋》虽以史书为依据，包含历史事件的过程梗概，但很多生动的细节，一些绘声绘色的描述，乃是瞽史们合理想象、艺术创造的结果，所以实为讲史的文学性作品（以上见该书《前言》）。当然，先秦一段很多作品的时代、作者及创作情况不清，所以采用论述式的方法较为方便，而作编年则难度很大。从这一方面说，这部《先秦文学编年史》确为开创之作。对书中一些问题的处理，大家会有不同意见，这也是正常的。这部书的好处也在于：它是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处理学界的一些分歧意见的，既考虑到大的学术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也考虑到很多具体事件间的相互关系，比孤立地谈一件事、一个人、一篇作品要可信得多。有此一书，将来我们讨论某一具体问题，就便于从大的背景上，联系多方面的事件、现象，作综合的考虑。

二、根据先秦文学的特点，本书同以往几种编年体文学史著作相比，体例上也有所创新。如原始社会一段，文学内容较单薄，也无法系年，书中即以《引论——由考古发现看原始社会的文学》加以概括介绍，一则妥善处理原始社会本身有其特点的一段历史，二则可以让读者明了夏代文学产生的文化根源与背景。全书有一篇《前言》，对先秦时代已发展成熟的几种纯文学作品，加以总体论述，而对于在编年体文学史中无法完整体现的事实，如先秦时代民间一些季节性的聚会对歌活动，先秦时代的文学观念、文艺思想的发展状况等，也在《前言》中详加论述。另外，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每部分之末尾均有一篇《综论》，对该时期文学的特点、文体、文学表现手法、主要成就等，予以概括说明，这是近几年来已出版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都未有的，实际上是在具体编年撰作基础上补作理论阐释，颇有新意。应该说，编年体文学史著作比其他形式的文学史著作，更有难写之处，而先秦一段比其他时段，难度更大，逵夫先生是力求体例严密，尽可能完整、全面反映这一长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的。当然，书中对某些问题的处理，学者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正常的，著者可能在若干年之后，自己也会有所修订。而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对此书的学术含义和学术延续性，是坚信不移的。

三、本书关于文学的概念，大体与《文心雕龙》所论述的一致，但同时在《前言》中又突出地论证了今天我们所划定的文学作品在先秦时代的发展状况。该书首先向读者展示先秦文学原生状态发展概况，读者自己则可以从各个方面加以分析、归纳，找出某些联系，甚至总结出某些规律。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翻阅了大量的书籍、文献，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比较，择善而从。先秦文学范围内的每一个问题，作者几乎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力求做到尽可能准确的反映。如果说我们在以往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看到的是局部，是条块，甚至是管中所窥之豹，这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完整，是全豹。此书以实证方法反映了作者对某些前沿性问题的思考，因此可以说是对先秦文学、先秦文化带有前沿性的研究著作。

在 1997 年黑龙江大学召开的那次会议上，逵夫先生的大会发言中曾经

说:“强调扎实严谨的学风,不是不要创造性。这二者不是对立的、排斥的。只有深入扎实的工作,才能作出创造性贡献。科学上每一步都得付出艰苦的劳动。……我们具有现代科学思想,掌握现代科学方法,可以超越前人。但就是现代科学理论,也应下工夫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应该认真读,有关史料应该掌握。不然,所造体系只能是纸糊楼阁,所谓突破也只是一时的轰动效应。”(《百年学科沉思录》,《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我觉得,逵夫先生主编的这部《先秦文学编年史》,正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自那时至今刚好八年时间,他在这八年中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完成了这个项目。回忆当时我们讨论这个项目时的情景,看着摆在面前 100 多万字的书稿,真是由衷地欣慰、钦佩。以此陈述己见,以应逵夫先生作序之嘱,并请学界指正。

傅璇琮

2004 年冬初稿

2005 年春修订

序　二

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先生约我为他主编的《先秦文学编年史》作一小序，情意殷切，命至再三，我虽不敢推辞，却迟迟未能着笔。熟悉我的友人都晓得，近年我常有机会撰写序跋，但文学领域却是我不敢涉足的。我自知对文学艺术所知甚浅，或者可说是性之不近吧，总觉得是力不胜任的事。不过，在细看了《先秦文学编年史》的内容，特别是赵逵夫先生的《前言》之后，还是有一些话要说。

首先打动我的，是赵逵夫先生强调“文学史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既是历史的一部分，就有可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和视角去考察。如赵先生讲的，中国传统史籍有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其间编年体出现最早，如孔子所修《春秋》与汲冢出土《纪年》。以年系事，以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给以时间的标尺，从而使种种模糊混沌的事件变得明晰有序，纲举目张。

将事件以及人物放回其原有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本来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编年体的运用，正有利于最直观地体现这一点。在上个世纪，这种历史体裁曾在学术史方面取得显著成功，例如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刘汝霖先生的《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久已脍炙人口，至今为学者所必备。钱、刘两先生的书，都以文献的梳理考辨为主，间以论议，还不是系统的史书撰作。现在赵逵夫先生主编的这部书，则认为采用编年体来写先秦文学史，“必然会反映出在其他角度上观察不到的一些现象，发现用其方式不能反映出的规律，提出一些其他文学史著作不能提出的问题”。以此宗旨贯穿的《先秦文学编年史》，具有本身的特色，确实是富

于创新性的。

编年体的文学断代史,《先秦文学编年史》并不是第一部,赵先生《前言》里即提到傅璇琮先生主编并为之作序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我之所以称赵先生主编的这部书有创新性,是由于先秦文学以及先秦时期的整个历史文化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大家知道,我国历史年代,根据司马迁《史记》,能够准确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 841 年,再往前则多有异说。即使是春秋战国,许多问题也是争论纷纭,情形与秦汉以下大不相同。《先秦文学编年史》从夏商西周,一直叙述到秦的统一,规模宏远,前所未有,包含着许多新的观点和尝试,所遇到的不少问题,是其他断代没有的。

书中所系年代,使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的《夏商周年表》作为时间框架,这是我们要表示感谢的。这一年表自然还有需要补充修改的地方,希望读者多多赐予批评意见。

《先秦文学编年史》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便是在广泛搜集有关文献之外,又结合引用了许多出土文字材料。《前言》说:"要在先秦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先要弄清全部先秦文学的实际状况,包括文学本身大大小小的各种材料,各种现象及同时相关艺术学科的材料,还应弄清这一切的发展演变同当时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赵逵夫先生接着指出:"近几十年地下很多文字资料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条件,不只使我们对某些具体作品的真伪、时代、作者等有了新的认识,而且改变了我们在认识先秦文献、先秦历史上的观念。现在我们在先秦文学有关材料的展示方面,在文献学的研究方面,完全可以为先秦文学研究在理论创新上,在一些结论的更新上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

这充分表现出赵先生的远见卓识。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量古文字材料,尤其是简帛书籍的发现,不仅是在量上增加了文学史的依据,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在认识先秦文献、先秦历史上的观念"。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已经尽可能吸取了他所能见的古文字资料,其后也有不少学者注意这类工作,但是他们的观念并未因之改变。《先秦文学编年史》是在新的认识、新的观念的基础上编著的,其内涵和面貌却有新颖之处,值得

向读者推荐。至于书的具体成就，超出我的知识范围，只有请读者亲自品味了。

李学勤

2005 年 7 月 25 日

于清华荷清苑

前 言

一、编年体文学史的特征与意义

文学史究竟怎样写才好？学者们曾经发表过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各种形式的都可以有。编写的角度不同，方式不同，必然会反映出在其他角度上观察不到的一些现象，发现用其他方式不能反映出的规律，提出一些其他文学史著作不能提出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史书有纪传体，有编年体，还有纪事本末体等形式。体裁上大体属于同一类型的，一部与一部也不完全相同，甚至会派生出新的体式。如由编年体派生出的“纲目体”，虽然简略，但线索清楚，便于记忆，便于观察比较事件间的关系，因而也颇受人们的欢迎。可以说，各种形式，各有千秋。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中作者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如篇末论赞）对某件事、某个人物进行评价；即使编年体、以纪事为主者，也往往借“君子曰”之类（《左传》的办法）或作者在有关部分事件之后的议论（《资治通鉴》的办法）来表示自己对人、事的看法。20 世纪的一百年中，产生了不少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新的编撰体例撰述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是用章节体的形式（或曰论述式）。在叙述历史基本发展线索的同时，对有些问题加以总结概括，力争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观察视角，自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理论上和方法上有迂回，也有变化，但史书的编写方式却都采取这种模式，有一种僵化的趋向，也是一个问题。

文学史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在文学史的编写中，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读五十年来的文学史著作，基本都是章节体，有些甚至连章节安排都大同小异。应该说，文学史家以先进的理论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总结、概括，以揭示事情的本质，将结论提供给读者，比描述一些具体事件更容易让读者获得理性的认识，也使一些缺乏分析和概括能力、缺乏理论水平的人对文学发展历史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从理论上进行概括而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尽管从总体上来说要比编年、纪传等形式的文学史著作优点多，但也有它的不足：

一、从内容选材方面说，作者往往只提供他想让你看的材料，他不想让你看的材料你看不到。

二、人们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的评价，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水浒传》、《续金瓶梅》（丁耀亢）都因内容上不合当时统治者的利益而被禁，但今天看来，前者写农民起义，后者写金人南下的烧杀抢掠，正是其进步之处。很多民间作品在封建统治时代被认为低俗、粗糙、难登大雅之堂，今天看来正是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充满了真情，在形式上给文人之作以启示。《诗经·大雅》、《小雅》中的作品过去被看作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东西，缺乏“人民性”、“思想性”，认为艺术水平不高。现在看来，并非完全如此。其中有歌颂周民族祖先艰苦创业、抵御侵略、发展农业的诗篇，也有写宣王前期内忧外患情况下召穆公、尹吉甫等团结宗族、消除矛盾、平定反叛、安定社会的诗篇。这些作品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主要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的一些文学史著作都采取章节体的编写方法，先秦文学按书或文体被划为几大块，这同当时史学领域“兴无灭资”、强调批判、提倡“以论带史”的编写方法有关。当时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很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不多、不深，而受旧的治学方法、历史观点及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所以要强调理论指导，强调用什么思想来观察和总结历史；同时，那时候也需要一些理论上高屋建瓴、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事件、